

国学三部曲

国学探疑

宋定国 著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国学三部曲

国学探疑

宋定国 著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学探疑/宋定国著.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1
(国学三部曲)

ISBN 978-7-5656-1289-3

I. ①国… II. ①宋… III. ①国学-研究-中国 IV. ①Z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12504 号

GUOXUE TANYI

国学探疑

宋定国 著

责任编辑 刘志勇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西三环北路 105 号

邮 编 100048

电 话 68418523(总编室) 68982468(发行部)

网 址 www.cnupn.com.cn

E-mail master@cnupn.com.cn

三河市博文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8.75

字 数 317 千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退换

内 容 简 介

《国学探疑》是作者在对“国学”的研究中，对某些问题的质疑，其中有些属于长期遗留的“历史问题”。

在写作方法上，本书采用列题式，既无需考虑一般论著所要求的框架结构及其逻辑体系的完整性，又免去了承上启下衔接等文字，因而简明、扼要，避免了拖泥带水；尽量减少征引和注释，实在必不可少的注释则采用夹注。同时，继承了中国传统学理性散文的写法，在保证学术观点准确表述的前提下，行文流畅，富有韵味，因而具有较强的感染力、说服力、可读性和耐读性。

本书所提出的一百多个问题，涉及“国学”中的难点、热点，均依据最新的考古发掘材料和翔实的文献，有理有据地进行了探释：或矫正，或修补，或重新厘定；凡有确凿而翔实的资料可以佐证的，则大胆提出，不乏独到见解，而尚缺乏确凿、翔实的资料佐证的，则留作疑案，决不臆测和妄断。

另外，本书还尽量避免使用“习以为常”的某些含糊用语。如在时代称谓上的所谓“古代”、“当代”、“现代”、“近代”和“现代化”、“后现代化”等等，因为时代在不断前进，处于不同时代的人所使用的上述同一个概念，其所指的具体年代和具体内涵差别很大，容易产生误解、歧义，所以，本书除了对古代史可用明确朝代来标明，如“汉代”，“清末民初”等外，一律用通用的国际公元纪年来标明具体年代，如“20世纪20年代”，“21世纪初”等；在“化”上，则明确其所指，如“机械化”、“电子化”、“信息化”，等等。

还有，哲学上所讲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也同样容易产生歧义，甚至可以说是错误的称谓。因为所谓“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原本就是在探究世界的本原，是物质在先还是精神在先的问题时，才加以区分的，即认为世界的本原究竟是物质（物）还是精神（心），而并没有其他意义，故而理应划分为“物本主义”和“心本主义”（见张岱年著《中国哲学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才妥帖。故本书采用了这一称谓。固然，纠正这类错误概念，要经由国家权威部门裁定，本书带头这样做，旨在刺激、呼吁学界和有关部门尽快纠正这一历史性的错误称谓！

“上下求索，探疑释难”之主旨贯穿全书，无论作者的探释是否确当，但这种探疑求真的治学精神，无疑对于推动“国学”研究的深入和普及，对于中国学术走向世界，具有重要意义。

前言

我为什么要写《国学三部曲》

我写作《国学三部曲》，既不是一时冲动，也不是为了追求名利；名利之于我，虽不敢妄称“身外物”，但确实澹泊了。在“天命之年”以后，一方面因为对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对中国历代文人墨客之升降浮沉的了解，特别是对养生学的研究，使我对所谓“世道”和“人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体悟到在和平环境下，“生存是第一需要，健康是人生至宝，长寿是最大幸福”，因而学会了从包括名利在内的“物累”中自我解脱；另一方面，是因为自己作为一个出身于半医半农家庭且土生土长的人，对业已取得的成绩，已经知足，聊可自慰了。

我写此书更不是想标新立异。作为一个已过“耳顺之年”的人，早就没有那样的心劲了！

坦诚地说，从1993年当上教授之后，我就感到了一种解放，一种从为了职称的评定和晋升，而不得不忙碌于自己并非完全情愿的、对某些方面的研究及著述的解放，而进入真正自由地研究和创作的时期。

除了迫不及待地回到我自幼所钟爱、却不得不久违了的文学园地，心情愉悦地耕耘外，还重新仔细阅读家父留下的大量医书、方剂及诊断笔记，并由此引发了进一步研究中医、养生学的兴趣，由此又继而引发了我对于它们与易学，以及自幼所同样钟爱的史学，及整个中国传统学术，即“国学”研究的兴趣。

在这过程中，虽然积累了不少资料，进行了不少思考，产生了不少想法，但我却一直侧重在文学创作，以及《周易》与人生、养生等课题的研究和写作上。因为在这方面所积欠的情债最重，积存的手稿和资料最多，因而饥渴感和创作欲也最强。在撰写并出版了《周易人生哲理博览》《周易人生醒世真言》和《周易与养生》，以及长篇小说《悬壶梦》和《变形姻缘》之后，仍想就相关话题进行著述、创作。由于注重养生，我把研究和写作当做日常的消遣和娱乐，在想写（有心劲）和能写（有精力）的时候才写，而从不“赶进度”，从不强不可而为之，更不“拼命”，习惯了按自己的意愿，轻松愉快而从从容容地写。按

照多年形成的写作习惯，要把自己想写的都写出来，至少还要20年。而在这样的写作计划当中，“国学”却并不在其内。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我突然改变计划，非要写作《国学三部曲》呢？

促使我写作《国学三部曲》的直接原因，是一代宗师张岱年先生的去世所引起的关于“国学”和“国学大师”的争论。争论尽管限于个别人之间，却激发了我的写作热情。

2004年4月下旬，当得知自己所爱戴的师长张岱年先生去世的消息后，我一下就呆了！先是含泪写了悼亡诗，接着又含泪撰写《默默地送别一代宗师——追忆张岱年先生》，并在参加4月30日向张先生遗体告别仪式后完稿，在人民日报社主办的《大地》杂志第10期（5月下旬刊）上发表。本来，想在完成长篇小说《三梦》（《愚壶梦》、《鹤桥梦》、《乌托梦》）和《特殊祭品》等书稿后，打算在专心照顾年迈卧病的娘亲的空暇歇息歇息，顺便对时下文坛的炒作歪风，和某“畅销书”作家差错百出的所谓“历史散文”发表点看法，但张先生的逝世一下让我乱了方寸，使我在对那位作家和相关的出版社发表了两篇善意的评论性文稿后，就再也无暇顾及了！我的心神久久沉浸在对一代宗师的缅怀之中。5月6日，当看到某家颇具影响的报纸刊登的文章中，披露了学界一两个人对张岱年先生的学识提出质疑，并就“国学”等话题所引起的相关争论时，我的心灵猛地一震，许多与张先生和“国学”有关的话题，犹如突如其来的风暴，在我的脑中急剧刮起，使我陷入深沉的反问和思考的轩然大波之中。当我参加了5月15日由清华大学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北大哲学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和哲学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中国思想史研究室和中华孔子协会等合办，北京世纪群学文化传播公司协办的，《纪念张岱年先生95周年暨中国文化综合创新学术研讨会》后，心情更是无法平静，在无限地追忆、缅怀、沉思和反问中，先是冒出了以报告文学的形式写作张先生的念头。后来便请教了张先生的家人及汤一介先生等师长。汤先生在回信中，把他发表的《我所认识的张岱年先生》的复印件一并寄来，并说由于忙于编纂《儒藏》等，不准备再写有关张先生的文章了。谈及评价人物时，汤先生强调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世上没有完人，没有神人，对于每个人的长处都要具体分析，不能泛泛而谈，言过其实。汤先生言简意赅的教诲，使我深受启发：我想，评价人物一定要坚持的实事求是这个原则，也同样适用于任何学术问题的探究啊！

之后，我接连研读了张先生的一些著作，了解了张先生的主要学术主张和创见等等，但关于张先生的生活素材的搜集却比较困难，而这对于以报告

文学的形式写作，则是非常大的难题，于是我改变初衷，产生了写作此书的念头，并一发而不可收。

不过，促成我写作此书的根本原因，则是自己长期以来在对“国学”的学习、研究过程中，所产生并积累的疑问、思考和想法等的喷发。

由于主客观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使我在经历那场充满坎坷和磨难的漫长“浩劫”岁月之后，通过考研而“打回”首都，毕业后为了解决燃眉之急的住房问题，而主动到一所培训团干部的学校，不久虽然歪打正着地创办了大学，但至今恐怕仍是全国数得着的很小的大学任教；同样由于主客观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使我成为一个不能安分的“杂家”——在为短训班和大专班讲授了几期自己所学的专业哲学课后，根据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创建后教学任务的需要，我主动选择了为本科生讲授领导科学、人才管理学等课程，可我的专业职称却依然只能走哲学系列，而我当时还没修炼到“不为稻粱谋”的境界，所以不仅不能离开哲学领域，而且还必须不断地拿出属于哲学学科范围的成果。同时，由于我自幼酷爱历史和文学，即使在那动乱而荒诞、漫长而沉重的岁月里，在百无聊赖的工作和必要的家务劳作之余，我也常把心思耗费在文史书籍地翻阅、思考和文学创作上。在进入新时期踏进大学校园任教而走上教学、科研的岗位之后，更是一有空就翻阅相关的书籍，思考、写作。改革开放所促成的各种新思潮、新观念的时兴和活跃，使我原本就比较活跃的思维越发活跃，因而涉猎的范围更广，加上先是负责新建学院所辟建专业基础理论部的领导工作，促使我必须熟悉诸如政治学、法学、心理学、伦理学、形式逻辑、经济管理和行政管理学等学科；而后又担任学院的科研处处长并主编学报，也逼着自己熟悉、了解更多的学科。在这样的过程中，我的知识面越是扩大，就越发现自己的无知和所知甚少，于是就越激发自己的求知欲。伴随对易学、医学和养生学等研究的深入，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深厚底蕴越发吸引我，使我发现自己作为“老五届大学生”，在知识功底上的缺陷，尤其是在传统学术文化知识上的肤浅。当我从中国哲学、易学、医学和养生学的研究扩大到“国学”的其他领域时，这种肤浅感就越发加重，于是促使我在50岁以后，把许多精力和时间都耗费到对“国学”书籍的研读上。但也许因为自己毕竟已不再是初学的孩童，毕竟不再像小学生那样对什么知识和观点都囫圇吞枣，毕竟在文化知识方面积累了一些个人见识，况且，自己从小就养成了爱质疑、好思考的习惯，所以，在涉猎中很自然地也就随时产生许多疑问和想法，有时还相当激烈、冲动。

然而，说句实话，即使对自己某些带有灵感性的观点有时难免一度自我陶醉或孤芳自赏，但也从未产生要就“国学”研究方面著书立说的想法，因为我深知“先天不足”和“后天失调”在自己身上留下的缺憾，使得自己不论跟前辈或后辈学人相比，都差距甚大，所以宁可期盼相关的著述从他们那里问世，自己等着拜读和欣赏就是了。但是，张岱年先生的逝世，报刊、网络等媒体对于张岱年先生，关于自己不配当“国学大师”的公开声明的褒读，尤其是学界个别人对张岱年先生学识和学术建树的质疑，空前激烈地引起我心灵的震撼，一种莫名其妙的激情和写作欲望突然使我改变了态度，决心把自己长期所积累的有关“国学”的想法和思考加以梳理，并结合相关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就学界和社会大众所关注和热议的一些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

而一当我扎进离家很近的国家图书馆，翻阅相关的文献和资料，尤其是追踪最新的考古新发现、新成果时，竟产生越来越多的疑问和困惑，就越发感到自己学识的不足和学界研究风气的滞后，内心的疑问、思考和想法自然也就越积越多，并时常陷于激烈的矛盾、冲突和不断地生灭消长之中。

尤其是当我看到，不断推出的考古新发现、新成果，正在不断刷新、改写某些古代典籍、史料和文献的内容和形式，而我们的某些研究者，包括被媒体和人们所称道的某些所谓“国学大师”，却依然关在书斋里，仅仅依据传世本而津津乐道，并被某些媒体和出版社大肆炒作时，就更有一种说不出的不解、不满，因而写作的欲望也就越发强烈了！

为此，我成天往国家图书馆跑。经过5个月的研究，我拟定了暂名《“国学”新论》的题目及一份提纲，未敢再打扰在“国学”方面颇有造诣的汤一介先生，便于10月3日寄给20多年来一直保持来往，并经常给我以指导的黄桷森先生。

我之所以执著地求教于屡屡自谦“不懂‘国学’”的黄先生，是出于“哲学家的头脑和睿智，对于即使涉足不深或从未涉足的领域，比起那些在某个领域经常跋涉的人来，往往更容易发现问题”的见解，况且黄先生自幼饱读诗书，受到良好的文化熏陶，熟悉中国学术文化；原来在西南联大最初学的是物理学，后来转为哲学，知识面广博；在几十年的研究和教学中，通晓哲学原理、马哲史等；而哲学作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概括和总结，在学术园地辛勤耕耘了几十年的黄先生，涉猎广泛，学富五车，富有触类旁通的睿智，则是毋庸置疑的了呢！

在当月的24日下午，我就收到黄先生的回复，先是客气地再次说他“不懂‘国学’”后，接着便就我所拟的《提纲》提了六条具体意见：一、你很关注国学问题，从提纲看内容丰富，思路开阔，书写成后该是本大著作；二、从提纲看，内容涉及很多，写作是个艰巨任务，完成要花费巨大的精力；三、究竟什么是“国学”还不清楚，一般有两种理解：一是把整个中国当成研究对象（即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中国学”），一是把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当成研究对象。但不论哪种理解，内容都很宽泛，怎么具体界定，需要好好斟酌；四、相比之下，把中国作为研究对象似乎更好些，可以像研究哲学一样，从高度概括的视角提炼出问题，加以研究；五、“国魂”和“国渣”的提法需要斟酌：“魂”一般指精神性的东西，而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中精神性的东西，也并不全是精华，也包括自私、不团结等民族劣根性的东西；六、对“国魂”中提到的追求和平、和谐等等，要注意不要忽视斗争性，战斗精神；对于“国渣”中“尚清谈”也要具体分析，不能把基础性的理论研究当做“清谈”，要考虑到过分注重实用而忽视、排斥本体论研究的倾向。

黄先生这么早地回复出于我的意料，回复得如此中肯、具体、重要，富有指导性，更出于我的意料，使我这个“编外弟子”深受感动。

之后，我反复琢磨、领会黄先生富有指导性的意见，经过半年多的研究、写作和思考，鉴于问题和想法较多，而且并不都限于学术问题，不便在一本书尤其是学术性著作中阐述，经再次请教黄先生后，于是决定分作三部即《国学览胜》、《国学探疑》和《国学纵横》，并名之曰《国学三部曲》。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黄先生的指导、勉励，就没有我的《“国学”三部曲》的写作！

《国学览胜》，旨在对“国学”中的精华和神韵进行浏览式地概述；《国学探疑》，旨在就自己对于“国学”研究中所产生的疑问进行探释；而《国学纵横》，则旨在针对古今在“国学”研究和运用中所存在的某些问题，加以评论，发表己见。

鉴于有关“国学”的典籍浩如烟海，有关“国学”的研究和讨论纷繁复杂，尤其是不断涌现的考古发掘的新成果，仍在不断刷新、改写相关的典籍、史料和文献等，而我个人的精力和时间有限，尤其是能力很有限，所以，面对自己所设定的每一个显然看似很大的题目，我都不便、也不能面面俱到，而只能仅仅涉及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而且，不论是《览胜》、《探疑》还是《纵

横》，都必须秉持汤一介先生所强调的“实事求是”原则，“依据信史文献，追踪并利用最新的考古成果，探疑求真，正本清源，厘真辨伪，析精祛糟”；“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凡所涉话题，必有新意、独见，而绝不‘鹦鹉学舌’，绝不‘老生常谈’，绝不讲‘空话’、‘套话’”的原则，才能使自己的著述具有一定的意义。

以上只是自己写作的初衷和愿望，至于是否言行一致？到底有无意义？有无价值？则只能交由读者，交由世人，交由实践来检验和评判了！

目 录

一	“国学”释义	1
1.	“国学”一词何时提出	1
2.	原有释义及其缺陷	3
3.	重新释义“国学”	8
二	“国学”之源	10
4.	为什么要探究“国学”的源头	10
5.	中华文明之源头	10
三	“国学”之萌发	17
6.	探究“国学”萌发的依据	17
7.	探究“国学”萌发须先探究一般文化的萌发	18
8.	物质文化的萌发与人类的起源同步	20
9.	中国物质文化萌发的具体年代尚不能确定	25
10.	物质文化及其萌发	29
11.	形神文化及其萌发	46
12.	一般精神文化与学术文化	62
13.	一般精神文化的萌发	63
14.	“国学”的萌发	64
四	“国学”之源头著作	70
15.	“国学”源头著作至迟形成于殷周之际	70
16.	当列为“国学”之源的主要典籍	70
17.	《易》乃中国学术之总源而绝不止是儒家经典	72
18.	所谓《五经》也都不止是儒家经典	75
五	“国学”之基本形态	78
19.	“国学”基本形态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	78
20.	“国学”基本形态产生的特殊文化环境	78
21.	“诸子百家”是“国学”的基本形态	80

六 诸子百家	81
22. 以往对“诸子百家”之划分欠妥	81
23. 中国古代学术分类的历史性缺陷	84
24. 不宜随意给诸子“定出身”、“划成分”	85
(一) 阴阳家	88
25. 关于阴阳家起源等方面的误解	88
26. 班固未提及阴阳家与医官渊源关系	90
27. 阴阳观念是构成“国学”大厦的基本砖瓦	90
(二) 道家	90
28. 究竟是《道德经》还是《德道经》	90
29. 以前关于道家思想渊源之论述多欠妥	91
30. 道家思想主要源于《易》，《老子》率先涉足“本根”问题	92
31. 首先使“道”升华为哲学基本范畴的是《老子》而非《易传》	93
32. 现在还不能全面评价老子其人其书及其学	95
33. 《列子》一书反映了列御寇的基本思想	96
34. 《庄子》是迄今中国第一个提出“本根”概念的作品	97
35. 对庄子其人其书目前也不宜全面评价	97
36. “老庄”和“道家”并非一回事	98
37. 道家在养生学方面建树卓越	98
38. 道家非道教，老子也决非“太上老君”	100
(三) 儒家	101
39. 儒家与道家有着师承关系	101
40. 《论语》乃儒学的奠基之作	102
41. 人道主义乃《论语》主旨	102
42. 孟子与孔子学说之根本差异	104
43. 综合创新是《荀子》的突出特点	104
44. 儒家的分化和孔子空担的毁誉	105
45. 儒学非教，孔子也决非教主	107
(四) 墨家	108
46. 墨家是个有着特殊贡献的学派	108
47. 墨子是以人道主义为思想基础的和平主义者	109
(五) 法家	110
48. 对班固就法家起源之概说历代多有非议	110

49. 韩非是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理论的发明者和导师	111
(六) 名家	113
50. 惠施和公孙龙为君王等政治家提供了思辨指南	113
(七) 杂家	115
51. 班固关于杂家起源之说似嫌敷衍偏狭	115
52. “杂家”只能从相对的意义予以评判	115
53. 胡适关于杂家的说法大错	116
54. 吕不韦实为钱、色、权交易之典范	116
(八) 小说家	118
55. 班固将小说家排斥在“九流”之外欠周	118
56. “小说”往往比正史更能反映社会现实	120
(九) 诗赋家	122
57. 诗、赋一家, 只是体裁和表现手法有别	122
58. 荀子实为赋体文学的奠基者	124
(十) 纵横家	125
59. 遭变用权受命而不受辞的纵横家	125
60. 纵横家之政治家外交家本质	127
(十一) 兵家	128
61. 反战是兵家的首要思想	128
62. 兵家的反战思想基于人本主义	130
(十二) 农家	131
63. 农家的基本思想是以农为本、以农立国	131
(十三) 医家	139
64. 医家和中医学产生于同疾病抗争的实践	139
65. 正确看待“巫医不分”	150
66. 中医学赖以建立的理论基础	151
67. 先秦中医学在分科医疗上的成就	158
68. 中医学的主要特点和优势	168
(十四) 算家	172
69. 中国算学及其代表作远远走在了世界前列	172
(十五) 天文家	175
70. 中国古代天学的辉煌成就	175
71. 独具特色的夏历	179

72. 先秦天文家的主要代表人物和著作	181
(十六)地学家	185
73. 中国古代地学的代表作	185
(十七)水家	186
74. 中国水学不仅起源很早而且很发达	186
75. 先秦著名水家及水利工程	189
(十八)堪舆家	194
76. 堪舆(风水)学起源于对居住环境利害关系的探索	194
77. 堪舆家主要代表人物及著作	196
(十九)数术家	197
78. “数术”与“术数”并非一回事	197
79. 宜缜密区分“术数”中的科学和迷信	200
80. “神秘文化”的面纱终将被一一揭开	200
(二十)其他学派	201
81. 其他实用学派纷繁复杂	201
82. 如何看待“百家”之说	202
七 “国学”之“流”	204
83. 应在什么意义上区分“国学”之“源”与“流”	204
(一)“汉承秦制”与“黄老之学”	204
84. 怎样看待“汉承秦制”	204
85. 怎样看待“无为而治”	205
86. “黄老之学”到底属于什么性质	207
87.《黄帝四经》真是黄帝的著作吗	208
88.《淮南子》的性质及其所给予的昭示	210
89.《白虎通义》是对“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的伸展	212
(二)《论衡》	213
90.《论衡》所体现的“国学”方向	213
91. 王充何以能写出《论衡》	215
(三)佛教	218
92. 佛教到底何时传入中国	218
93. 佛教何以能在中国立足和发展	221
94. 怎样看待佛教的中国化	222

(四)道教	225
95. 道教产生的缘由	225
96. 老子何以被道教神化	226
97. 不能把“道教”与“道家”混为一谈	230
98. 正确认识道教在“国学”发展史上的地位	230
99. 如何理解鲁迅名言“中国根柢全在道教”	231
(五)玄学	234
100. 玄学“玄”吗	234
101. 玄学何以促成“儒”、“玄”、“佛”、“道”相融达	237
(六)“佛老”与“儒释道”	240
102. “佛老”究为何意	240
103. 将“儒、释、道”并提妥帖吗	241
(七)宋明理学	242
104. 韩愈“道统说”是“君学”发展至高潮的前奏	242
105. 如何看待“道学”	244
106. 宋明理学乃“君学”发展之顶峰	248
(八)清代朴学	252
107. 应如何看待清代朴学	252
八 科举制度与“国学”	255
108. 科举制度在“国学”发展中的作用	255
九 清末民初的“类百家争鸣”	259
109. 清末民初出的“类百家争鸣”	259
110. 多变的时势造就多变的人格和思想	261
111. “新文化运动”对“国学”的影响	266
112. “打倒孔家店”对“国学”的影响	267
十 复兴“国学”	272
113. “国学”要不要复兴	272
114. “中华复兴”就是“复兴国学”吗	272
115. “复兴国学”就是“复兴儒学”吗	273
116. “复兴国学”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274
主要参考资料	275
后 记	277

一 “国学”释义

1. “国学”一词何时提出

一般学者都认为,“国学”这一概念是在清末民初提出的。

这里之所以用“提出”而不用“产生”,是因为就其内容而言,它显然在清末民初之前早就“产生”,并且延续了两千多年。

但就“国学”一词而言,古已有之。《周礼·春官宗伯·乐师》言:“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礼记·学记》又曰:“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孙诒让(1848~1908年)在其所著《周礼正义》中指出:“国学者,在国城中王宫左之小学也。”由此可见,“国学”在中国古代,指的是国家一级的学校,与汉代的太学相当,此后朝代更替,“国学”的性质和作用也有所变化。

唐代贞元中,李勃隐居读书于庐山白鹿洞,至南唐时,在其遗址建学馆,以授生徒,号为“庐山国学”(亦称“白鹿洞国学”、“庐山国子监”、“庐山书堂”等),是后人首次使用“国学”这一概念。到宋代,又改称“白鹿洞书院”,为藏书与讲学之所。宋代书院兴盛,涌现出白鹿、石鼓(一说嵩阳)、睢阳和岳麓四大书院。由此来看,“庐山国学”实际上是一所既藏书又讲学的“学馆”,亦即后来的“书院”。

在当时的情境下,所藏之书和所讲之学,自然是中国的传统学术文化。从宋代四大书院的实际情况来看,也是如此。可见此时“国学”这一概念的使用,与“国医”是一样的。“国医”即国家的医学,“国学”自然亦即国家的学术了。在还没有“西医”、“外学”、“西学”等概念的情况下,这本来是个很好理解和接受的概念,只是当“西医”、“外学”、“西学”出现后,才容易产生歧义而引起争论了。

但是,真正把“国学”同诸多“外学”相提并论,即作为一门统揽中国学术的概念提出来,则是在西学东渐、我国社会和学术文化处于空前转型的二十世纪初。

据我所查到的资料看,“国学”这一概念,最初还是在日本先出现的。

19 世纪末，面对西学和“欧化主义”的刺激，日本学界从世界文化格局中反思和重识本国文化，发出了提倡“国粹”、“国学”的呼声，并不无贬义地称中国文化为“支那学”。这就自然感染并刺激了处境相似的中国学人。1902 年秋，流亡海外的梁启超（1873 ~ 1929 年）曾与黄遵宪（1845 ~ 1905 年）等人商议，在日本创办《国学报》。但黄氏却主张先作“国学史”，使梁启超放弃了创办《国学报》的设想。而国粹派学者则趁此之时力倡“国学”。1904 年，邓实（1877 ~ 1951 年）在上海的《政艺通报》第 3 期发表《国学保存论》，论述了保存“国学”的重要性。次年 1、2 月间，邓实、黄节（1873 ~ 1935 年）等人在上海成立了“国学保存会”（参加者多为中国同盟会会员，或倾向革命的知识分子），以“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发行《政艺通报》《国粹学报》，标志着“国学”在国内的立足。

就总体而言，“国学”作为一个与“外学”相对应，并开始进行系统归纳和研究的概念，是在清末民初，为适应我国社会和学术文化发展之需要，应运而生的。

任何学说，都不会平白无故地产生，都是一定社会经济政治所培植的相应社会条件的产物。

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形态，为一定学说的产生培植了相应适宜的土壤、气候等条件；没有相应适宜的土壤、气候等条件，产生不出、发展不起来任何学说。

清末民初，伴随中国专制制度的动摇、瓦解，学术文化也洞开了封闭二百多年的闸门，西方的“科学”、“民主”思想和进步的学术文化大量闯入，对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带来巨大冲击。中国几千年的社会根基和文化思想，一度处于风雨飘摇和巨大转型之中。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西方列强在对中华民族实施政治和军事侵略的同时，也实施了文化侵略，甚至把文化侵略作为政治和军事侵略的前奏和先导。一些西方学者所捏造并鼓吹的“中国文化西来说”，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笼的。

每当外敌覬觐、掠夺我们中华民族的瑰宝时，国内总有极少数患软骨、昏头、色盲等症的人，出来迎合，战战兢兢地自暴自弃，妄自菲薄。且不说一般软骨头投靠帝国主义充当其文化买办，单说一班头脑发昏和妄自菲薄者，此时竟被西方人的“中国文化西来说”的鼓噪扰乱了神志，竟“数典忘祖”，否定“三皇五帝”时代，并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发生动摇。中国除了“全盘西化”之外，似乎就再也没有出路了！

正是在这样“内忧外患”之危急时期，一批富有爱国心的有识之士，伸